

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下册)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Jawaharlal Nehru

爸爸尼赫鲁写给 我的世界史

[印度]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著 梁爽 梁本彬 译

—— 下册 ——

第七卷 / 亚洲的觉醒 第八卷 / 新的战争风云

目录

第七卷 亚洲的觉醒

- 163 — 埃及，为自由而战…………… 903
- 164 — 英国控制之下的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 911
- 165 — 西亚重新回到世界政治舞台…………… 919
- 166 — 阿拉伯国家——叙利亚…………… 927
- 167 — 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934
- 168 — 沙特阿拉伯——告别中世纪，跃入现代社会…………… 942
- 169 — 伊拉克与空中轰炸的优势…………… 947
- 170 — 阿富汗与其他亚洲国家…………… 956
- 171 — 一场并未实现的革命…………… 963
- 172 — 偿还旧债的新办法…………… 971

- 173 — 货币的奇怪行为…………… 979
- 174 — 合作与对抗…………… 986
- 175 — 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996
- 176 — 民主与独裁…………… 1005
- 177 — 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运动…………… 1014
- 178 — 日本公然挑战世界…………… 1022
- 179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031
- 180 — 苏联的五年计划…………… 1041
- 181 — 苏联的困境、失败与成功…………… 1048
- 182 — 科学向前发展…………… 1059
- 183 — 科学是把双刃剑…………… 1067

第八卷 新的战争风云

- 184 — 大萧条和世界危机…………… 1075
- 185 — 引发危机的原因…………… 1082
- 186 — 美英世界领导权之争…………… 1091
- 187 — 美元、英镑与卢比…………… 1100
- 188 — 资本主义世界未能齐心协力…………… 1110
- 189 — 西班牙革命…………… 1114
- 190 — 纳粹在德国的胜利…………… 1119

- 191—裁军……………1133
- 192—罗斯福总统走马上任，收拾残局……………1138
- 193—议会的衰落……………1145
- 194—对世界的最后审视……………1151
- 195—战争的阴云……………1158
- 196—最后一封信……………1168
- 后记：1938年，新的疑云……………1177
- 译后记……………1198

第七卷

亚洲的
觉醒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163 — 埃及，为自由而战

现在让我们来到埃及。在这里，民族主义浪潮日益高涨，与帝国主义势力又展开了一场斗争。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埃及正经受着大英帝国的压迫。从很多方面来说，埃及与印度情况差异很大，它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印度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们的目标一致，都渴望获得民族自由。在镇压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行动中，大英帝国几乎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式。因此我们都可以从彼此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印度人来说，这个教训尤为特别，这是因为我们能从埃及的经历中清楚地看到：英国施舍给我们的“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又能把我们引向何方？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埃及最为发达。它是连接东西方的快速通道，这是自苏伊士运河通航以来轮船必经的伟大贸易航线。比起西亚各国，它与19世纪的新欧洲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这个国家独具一格，似乎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毫无关联，但是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文化关系，这是因为它们的语言、传统以及宗教是完全一样的。开罗的日报在阿拉伯国家中随处可见，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埃及是最早开始出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因此埃及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

在上一封关于埃及的信中，我已经提到过阿拉比帕夏在1881—1882年之间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这个运动是如何遭到英国镇压的。我也向你提到过那些早期的改革者，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以及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对正统伊斯兰教所

造成的影响。

这些改革者重新拾起古老的法则，摒弃这个宗教在漫长岁月中日积月累的沉淀，试图以这种方式让伊斯兰教与时俱进。这些进步人士的下一步措施是把宗教与社会机构分离开来。古老的宗教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渗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规范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除了宣扬宗教教义之外，还制定了关于婚姻、遗产继承、民事以及刑事法案、政府机构，还有几乎其他各个方面的社会准则和规定。换言之，它们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结构，并赋予它宗教制裁的权力以及权威性。在这个方面，印度教因其严格的等级制度而显得最为突出。宗教渗入到社会结构之中，这对改革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埃及的进步人士也努力尝试着把宗教与社会结构或制度剥离开来。他们的理由是，那些在过去由宗教或者习俗所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制度，无疑是符合了《圣经》(Scriptures)时期的普遍情况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为不同了，因此这些古旧制度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牛车行驶的规则一定不会符合汽车或者火车的行驶要求，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

这是那些进步人士和改革者常用的论点。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是，这个国家以及诸多制度日益世俗化，也就是说，它们与宗教脱离了关系。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去宗教化行动尤为彻底。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甚至不再以上帝的名义而是以个人的名义宣誓就职。

当然埃及还未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在这里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里也产生了相同的趋势。土耳其人、埃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等逐渐放弃使用古旧的宗教语言，而更多转为使用民族主义的新语言。也许印度的穆斯林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穆斯林团队更加抗拒民族主义进程，因而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其他宗教人士相比，他们更加保守，宗教观念更为根深蒂固。

这个事实引人注目，令人感到惊讶。新民族主义进程通常伴随着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下的一个中间阶层)的发展。印度的穆斯林在中产阶级的发

展中早已滞后了，这一失败或许已经阻碍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进程。可能由于他们在印度是少数群体，因此他们内心充满恐惧，这就让他们变得更加保守，紧紧抓住古老传统，并怀疑一切新兴观念和思想。大约 1000 年之前，在伊斯兰教侵入印度的早期阶段，印度教教徒龟缩起来不敢反抗，并在组织内部形成了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必定与这种心态不无关联。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内，新兴中产阶级在埃及迅速发展起来，并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个群体得以继续壮大。其中有一位杰出人物萨德·柴鲁尔，出身于埃及的贫农家庭。1881—1882 年间，阿拉比帕夏领导反英起义，年轻的萨德·柴鲁尔加入了这个队伍。从那以后直到他于 1927 年过世的整整 45 年间，他一直为埃及的民族自由而奋斗，成了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这个贫农出身的中产阶级人物在埃及的领袖地位毫无争议，广受农民阶级的爱戴，并成了中产阶级的偶像。但是那些所谓的上层社会，即旧式封建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十分憎恶他。他们讨厌这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因为这会逐渐威胁到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主导地位。在他们的眼中，柴鲁尔就是个出头鸟，他代表着中产阶级，并领导这个群体与他们不断地斗争。跟在印度的情形完全一样，英国人同样试图获得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实际上这个阶级大多是土耳其人而非埃及人，他们代表着在过去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

因此，在埃及的英国人继续利用那套屡试不爽的帝国主义手段，试图与该国的某些社会团队或者政治力量结成同盟，挑拨离间，引起内斗，以此来阻止它的民族独立进程。跟在印度的情况一样，他们想要利用信奉基督教的埃及科普特人来挑起少数派问题，但是他们最终失败了。他们总是嘴上说着伪善的言辞，急于表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方的利益，这也是他们常常使用的花招；他们自称是“几百万沉默的民众”的“保护者”，如果那些“煽动者”以及那些“在这个国家并无利益关系”的人不再制造麻烦，那么一切都将会十分美好。顺便说一句，这个赋予利益的过程通常会演变成对获益者的大肆屠杀。也许这种方式会让他们

远离这个苦难的世界，能够更快地开启天堂之行。

从战争时期开始直到很久之后，埃及都处于严密的军事管制之下。在战争期间还通过了一个裁军法案和征兵法案。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并在战争初期宣告埃及成为英国的“受保护国”。

1918年战争结束，和平到来，埃及的民族主义人士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向英国政府以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埃及独立的要求。那时埃及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有一个名为“爱国者”（Watanists）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员人数却很少。当时有人提议让萨德·柴鲁尔帕夏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伦敦和巴黎，提出埃及独立的诉求。为了让这个代表团获得强大的支持，能够代表国家的利益，一个组织便应运而生，它的规模迅速扩大起来。这就是伟大的埃及华夫脱党（Wafd Party）的前身，“华夫脱”一词正是代表团的意思。英国政府拒绝允许该代表团前往伦敦，并在1919年3月逮捕了柴鲁尔和其他几名领袖。这随即引发了一场血腥的革命。一些英国人死于这场暴动，而开罗以及其他一些中心城市被革命委员会控制起来。许多地区纷纷成立公共安全民族委员会（Nationalist Committees of Public Safety）。大学生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反抗运动。但是在最初的胜利之后，这次反抗运动基本被镇压了下来，尽管偶尔仍会有英国官员遭到暗杀。虽然从表面而言，这次暴动已经遭到了镇压，但是这次运动还远未结束，只不过它改变了行动策略，转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消极反抗阶段。这种方法十分奏效，因为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满足了埃及人的要求。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的委员会从伦敦抵达埃及，而埃及的民族主义人士决定要抵制这个委员会，并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学生们再次在这场抵制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埃及全国上下的一致抵抗，委员会受到很大的触动，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建议。但是英国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因此从1919年初到1922年初，埃及的抵抗运动又持续了三年之久。除了完全独立，埃及人其他条件都不接受。

柴鲁尔帕夏在1919年入狱不久就被释放出来，但是在1921年11月时再次遭到

拘捕，并被驱逐出境。但是英国人认为埃及的形势并未好转，因而他们只好采取措施安抚埃及人的不满情绪。尽管柴鲁尔远非那种绝不妥协的极端分子，但是那些所有做出让步的尝试均告失败。的确，有一次一些人采取行动，企图暗杀柴鲁尔。这些人指责柴鲁尔是一个可耻的叛国者，认为他软弱无能，向英国人做出了不应该的让步。但是，英国政府和埃及民族主义分子之间未能达成协议的真正原因一直都是根本性的，这与印度的情况极为相似。埃及民族主义分子并非是想要忽略英国在埃及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早已完全准备好去讨论这个问题，并愿意体谅英国在帝国贸易、战略路线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是他们要求在民族独立得到认可并不会受到损害的前提下，才能和英国讨论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英国却认为只有它才有资格决定到底给予埃及多大的自由，并且这个自由不能触犯它的利益，它的利益必须得到优先保护。因此双方完全无法达成共识。但是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必须马上做出行动，因而即便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仍在1922年2月28日发出一则宣言。他们声明将来会把埃及认定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是个语气十分强烈的但是），还有四个重大问题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考量。这四个问题是：

1. 大英帝国在埃及的通信安全问题。
2. 直接或间接保护埃及，抗击任何外来侵略或干涉。
3. 保护在埃及的外国利益以及少数派利益。
4. 苏丹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

这些遗留问题与印度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护卫者”，在这里他们的残余势力更甚。这些遗留问题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就算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简单无害，但是它们意味着，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这个国家都不会享有真正的独立。因此1922年2月28日的独立宣言只是英国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是不会得到埃及的承认的。在随后的数年里，在埃及，这些遗留问题或是英国的“护卫者”影响下的独立，充分展现了其本来的面目。

尽管埃及已经获得了这种“独立”，但是英国官员下达的戒严令依然持续了一

年半以上的时间。直到埃及政府通过了一项免罪法案，这个戒严状态才得以终结。这项免罪法案规定，在戒严期间，所有官员都无须对他们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在这个刚“独立”的埃及，宪法极为保守，形同虚设，它完全处于国王福阿德一世（King Fuad I）的控制之下，这个国王对贫苦的埃及人民实施了极为残酷的暴政。福阿德一世和英国官员一拍即合，他们都非常憎恶民族主义者，也反对人民的自由思想，甚至还反对建立真正的议会制政府。福阿德一世认为他就是政府，他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解散议会，并凭借英国的武力对埃及进行专制统治。当然英国从未让他失望过。

在英国政府宣布埃及独立之后，它首次提出了普惠举措，提出要划拨巨额资金，以补偿那些在新政权下退休的官员。福阿德一世代表埃及政府，爽快地表示了同意，从而政府为此支付了高达650万英镑的巨额费用。有一名高级官员得到了8500英镑的补偿，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额了。但有趣的现象是，有一些获得高额补偿的退休官员很快签订了特殊协议，又重新获得了雇用。要知道埃及不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总数还不及印度联合省的三分之一。

埃及制宪人大胆地在宪法中规定“所有的权力源自国家”。事实上，自从新宪法生效以来，埃及的议会一直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议会能够存续到正常的任期结束。福阿德一世一再突然宣布解散议会，他下令暂停宪制，在埃及施行起君主专制统治来。

新议会的第一次选举在1923年举行，柴鲁尔帕夏领导的华夫脱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了90%的选票，在214个席位中夺得了177个席位。他们努力尝试着与英国达成协议，而柴鲁尔为此专门前往伦敦。但是双方的观点立场完全不可调和，在几个问题上的分歧使得谈判完全崩溃。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丹的。苏丹北邻埃及，但是它与埃及完全不同：首先，两国人种不同；其次，语言不同。尼罗河的上游流经苏丹境内。从有史记载以来，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7000到8000年，尼罗河一直都是埃及的生命线。尼罗河每年会定期泛滥，来自阿比西尼亚高

原的肥沃土壤被洪水带到埃及，将原本荒芜的沙漠变成了富饶肥沃的土地，因此埃及的农业和人民的的生活都有赖于此。米尔纳勋爵（遭到埃及人抵制的委员会成员）对尼罗河是这样描写的：

这条伟大的河流为埃及人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水源。它对埃及来说，可不仅仅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繁荣，它更是一条生命之源。只要它的上游不在埃及的控制范围内，埃及就不得不时而面临着威胁。这件事光是想想都让他们觉得无比难受。

尼罗河的上游正是在苏丹境内，因此苏丹对于埃及来说意义极其重要。在过去，苏丹是英国和埃及的“共管国”，因此它曾被称为“英埃苏丹”（Anglo-Egyptian Sudan）。由于当时英国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因此英埃两国并无利益冲突，而且埃及还给予了苏丹大笔资金援助。的确如此，1924年之时，寇松勋爵曾在英国议会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埃及没有向苏丹提供财政援助，那么苏丹早已破产了。当英国最终面临离开埃及这个问题时，他们就像要抓紧苏丹，绝不放手。而埃及人却认为，是否能够掌控住在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游，这就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因此英埃两国的利益冲突就此产生。

1924年，萨德·柴鲁尔与英国政府就苏丹问题展开讨论，这时苏丹人民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埃及的深深依恋。为此他们遭到了英国人的严厉惩罚。尽管苏丹是英埃两国的共管国，但是埃及政府事先完全不知道英国人会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对此埃及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个所谓的埃及独立宣言中，英国还提出了另一个遗留问题，即外国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些外国利益是指什么呢？在前一封信中我已经略微提起过了。当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之时，列强曾强加各种条约，规定它们的公民在土耳其能够享受到特别的待遇。这些欧洲外来者不论所犯何罪，均不受土耳其法

律或者法庭的管辖，只有他们本国的领事或者外交代表，又或是那些由外来者组成的特殊法庭，才能对他们进行审判。他们还享有其他的特权，比如几乎不用缴纳税费。外来者的这些极其宝贵的特权被认为是“屈服”。这可以说是屈从，又可以说成是投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当事国丧权辱国的表现。由于土耳其不得不忍气吞声，因此在它统治之下的各个地区也不得不屈从于他们。虽然埃及当时完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它也完全不属于土耳其的统治范围，但是在这个方面被当成土耳其的属地一样对待，同样被强迫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外来者享受着这些无比幸运的条件，因此外国商人和资本家蜂拥而至，在各个城市中大量聚集起来。他们自然会反对废除这个体系，毕竟这是一个能对他们进行全方位保护的体系，他们甚至不用缴纳任何税费，从而能够快速地产家致富。这就是英国政府势必要保护的外国既得利益。埃及不可能承认这个体系的继续存在，因为它不光是与国家独立完全冲突，而且还会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损失。如果最有钱的一群人可以逃避缴税的话，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行动就势必难以进行。在英国直接控制的漫长时期内，他们在基础教育、卫生以及改善农村状况等各方面几乎一事无成。

在凯末尔帕夏取得胜利之后，曾经是最早做出丧权辱国让步的土耳其，完全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中国，它也正在为摆脱这些不平等的特权而努力奋斗。日本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内也遭受了这样的对待，但是在它强大起来之后，就完全摆脱了这种命运。

因此在英埃两国达成协议的道路上，外国既得利益的问题是另一个阻碍。自由常常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英国政府常常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态度，因而它又决定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也是1922年2月独立宣言的一个遗留问题。科普特人是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这些人可能是古埃及人的直系后裔，因此他们是埃及最古老的种族。他们信奉基督教，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在欧洲信仰基督教之前，他们就一直持有这样的信仰。然而，科普特人并没有感激英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却“忘恩负义”地告知它：不要来制造麻烦。英国在1922年2月发表宣言

后，科普特人随即举行了大型集会，决定“为了国家统一以及达到国家目标，特此放弃一切少数民族代表资格以及对他们的保护”。他们的决定遭到了英国人的谴责，被认为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但是，不管这种做法是聪明还是愚蠢，它都让英国人不能继续宣称要保护他们，从而少数派的问题不再成为讨论的话题。事实上科普特人在民族自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华夫脱党中，深受柴鲁尔帕夏信任的一些成员正是来自这个少数民族。

由于英埃两国相互矛盾的立场看法，以及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萨德·柴鲁尔和他的同僚所代表的埃及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于1924年完全被撕毁。英国政府对此十分震怒。他们早已习惯在埃及横行无忌，因而当他们发现以华夫脱党领袖为代表的开罗新议会顽固不化的时候，他们简直感到不可忍受。他们决定用帝国主义的方式，给华夫脱党以及埃及议会一点教训。很快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从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我将在下一封信中进行详细的叙述。这次著名的事件被看作展示现代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面镜子，因此值得我用一封信的内容来阐述它。

164 — 英国控制之下的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上一封信中，我提到，以民族主义者为代表的埃及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和谈于1924年宣告破裂，为此英国政府十分震怒。我先不继续讲述随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因为我必须首先让你明白，在这所谓的独立背后，埃及实际上仍然处于

英国的军事管制之下。英国军队仍然驻扎在这里，而且埃及的军队也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英国人担任着埃及军队的首脑，被称为“军队总司令”。埃及的警察总长们也是由英国人来出任。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借口要保护在埃及的外国人，仍然控制着埃及的财政、司法以及内务部。也就是说，他们控制着埃及政府的每一个要害部门。埃及人自然坚持要求英国放弃这些控制权。

1924年11月19日，英国驻苏丹总督兼埃及军队总司令李·斯塔克爵士（Sir Lee Stack）遭到埃及人的暗杀。在埃及以及本土英国人自然对此无比震惊；也许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更是备受惊吓，因为他们知道英国人的报复会冲着他们而来。英国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22日，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对埃及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埃及政府必须立即做出以下补救措施：

1. 正式致歉。
2. 惩罚暴徒。
3. 禁止一切政治示威游行。
4. 支付50万英镑的赔偿金。
5. 24小时内将全部埃及军队从苏丹境内撤出。
6. 撤销基于埃及利益而制定的限制令，解除苏丹用水灌溉的限制。
7. 停止一切反对英国政府保护在埃及外国人权利的行为。这条特别针对继续在埃及财政、司法和内务部任职的英国官员。

这七条要求相当耐人寻味。某些埃及人谋杀了李·斯塔特爵士，因此英国政府马上借机大做文章，甚至根本对此不加询问，就把这项罪名归结到埃及政府头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埃及人民都是谋杀犯。除此之外，他们从这个事件中获得了大笔赔偿，获益颇丰。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这次事件霸道地解决了他们和埃及政府之间的所有争端，而这些争端正是造成几个月之前两方和谈破裂的主要因素。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还要求必须禁止所有的政治游行示威活动，从